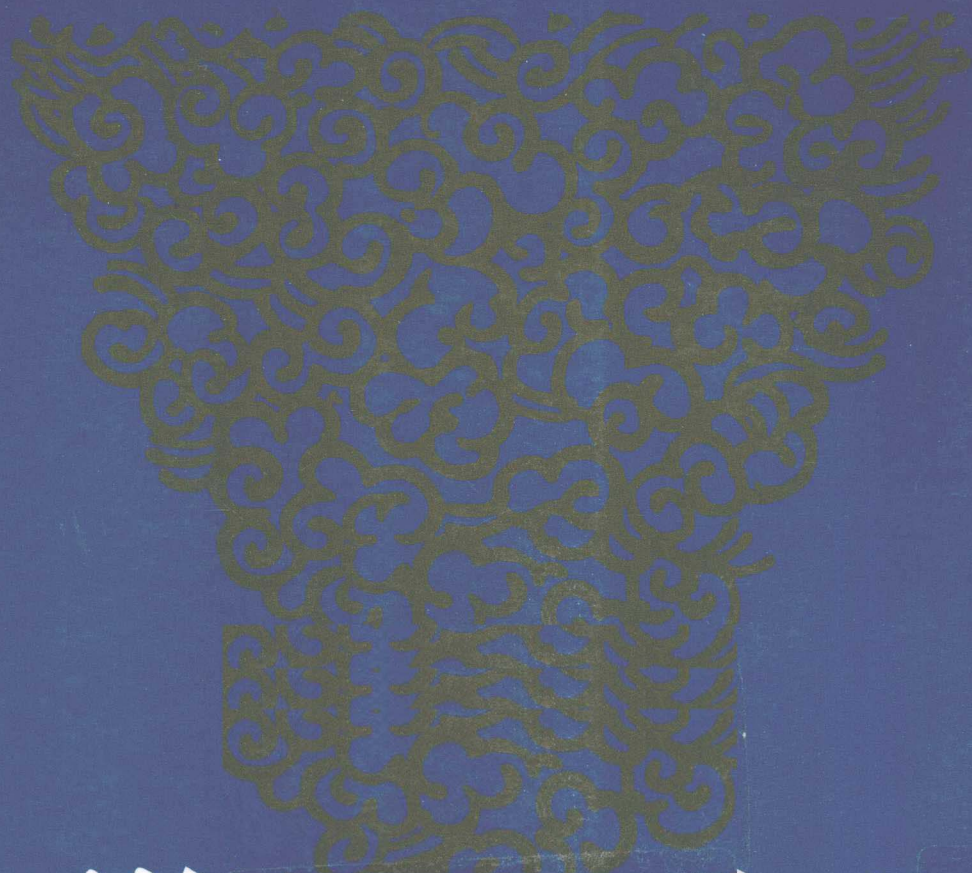




東萊博議

新譯

李振興 注
簡宗梧 譯
古今新注叢書
歷史類
三民書局印行

李振興
簡宗梧

注譯

新 譯

東萊博議

上冊

三民書局 印行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新譯東萊博議 / 李振興,簡宗梧注譯.——二版一刷.——

—臺北市: 三民, 2009

冊; 公分.——(古籍今注新譯叢書)

ISBN 978-957-14-4922-7 (上冊:平裝)

ISBN 978-957-14-4923-4 (下冊:平裝)

1. 東萊博議 2. 注釋 3. 春秋史

621.737

96020613

◎ 新譯東萊博議(上)

注譯者 李振興 簡宗梧

發行人 劉振強

著作財產權人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

發行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

電話 (02)25006600

郵撥帳號 0009998-5

門市部 (復北店)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

(重南店)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1號

出版日期 初版一刷 1991年7月

二版一刷 2009年6月

編號 S 030530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二〇〇號

有著作權，不准侵害

ISBN 978-957-14-4922-7 (上冊:平裝)

<http://www.sanmin.com.tw> 三民網路書店

※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公司更換。

刊印古籍今注新譯叢書緣起

劉振強

人類歷史發展，每至偏執一端，往而不返的關頭，總有一股新興的反本運動繼起，要求回顧過往的源頭，從中汲取新生的創造力量。孔子所謂的述而不作，溫故知新，以及西方文藝復興所強調的再生精神，都體現了創造源頭這股日新不竭的力量。古典之所以重要，古籍之所以不可不讀，正在這層尋本與啟示的意義上。處於現代世界而倡言讀古書，並不是迷信傳統，更不是故步自封；而是當我們愈懂得聆聽來自根源的聲音，我們就愈懂得如何向歷史追問，也就愈能夠清醒正對當世的苦厄。要擴大大心量，冥契古人心靈，會通宇宙精神，不能不由學會讀古書這一層根本的工夫做起。

基於這樣的想法，本局自草創以來，即懷著注譯傳統重要典籍的理想，由第一部的四書做起，希望藉由文字障礙的掃除，幫助有心的讀者，打開禁錮於古老話語中的豐沛寶藏。我們工作的原則是「兼取諸家，直注明解」。一方面熔鑄眾說，擇善而從；一方

面也力求明白可喻，達到學術普及化的要求。叢書自陸續出刊以來，頗受各界的喜愛，使我們得到很大的鼓勵，也有信心繼續推廣這項工作。隨著海峽兩岸的交流，我們注譯的成員，也由臺灣各大學的教授，擴及大陸各有專長的學者。陣容的充實，使我們有更多的資源，整理更多樣化的古籍。兼採經、史、子、集四部的要典，重拾對通才器識的重視，將是我們進一步工作的目標。

古籍的注譯，固然是一件繁難的工作，但其實也只是整個工作的開端而已，最後的完成與意義的賦予，全賴讀者的閱讀與自得自證。我們期望這項工作能有助於為世界文化的未來匯流，注入一股源頭活水；也希望各界博雅君子不吝指正，讓我們步伐能夠更堅穩地走下去。

序

1 序

《東萊博議》原書名《左氏博議》，是宋人呂祖謙，人稱東萊先生的名著。後人多以《東萊左氏博議》稱之，更簡稱《東萊博議》，為人所傳誦。它原本不是為闡揚經旨傳義而作，《四庫全書》卻將它歸入經部春秋類，而與《春秋左傳正義》視為一類，後來如《叢書集成初編》則將它歸入史地類。其實作者在序文中，開宗明義就說是「為諸生課試之作」，因指導諸生課試之文，「思有以佐其筆端」，而有此作。此書之所以能廣為流傳，恐怕也不是因為它可以「經緯世教，扶植人心，有裨於聖學」（胡鳳丹語），而是正如瞿世瑛所說，它「恃所操之機熟，所積之理多，隨所命而強赴之，亦莫不斐然可觀，以取盈篇軸，以僥倖得當於有司之目」有以致之。南宋以後，科舉考經義，沿承最久。仕途既然是士子唯一的出路，而科舉又為士子入仕主要的管道，課試之書，自然為士林所重。王樹之說：「士之習舉業者，代聖賢立言，其託體最尊，其措詞貴達，無取乎卑靡龐雜也。」而《東萊博議》「明乎義利之分，理亂得失之蹟，古今事為之變，典章名物之繁，英光浩氣，伸紙直書，按之聖賢精微之奧，不爽毫釐，得是書而讀之，於以擴其識、晰其理、鬯其機，無卑靡龐雜之習，具海涵地

負之觀，真升堂入室之階梯也」，王氏或許揄揚過度，但也沒有過於離譜。如今我們雖然沒有科舉考試，但各階段的入學考試，以及各種就業考試或升等考試，都考「國文」一科，必有「作文」一題，一向都以議論文為主。如今坊間有關議論文作法的書，雖然汗牛充棟，但大體都是形式的指導，和原則的提示，至於如何建立新的觀點？如何充實典故？如何運用譬喻？如何翻空出奇？如何承轉？如何迴應？能讓讀者充實腹笥、實受其益，目前恐怕沒有比《東萊博議》更好的書了。

瞿世瑛校刊本，說明：「宋本於篇目之下，詳載《左氏》傳文，今以文繁，且《左傳》在今日人人習誦，不須贅列，惟標注某公某年，以便稽考。」如今《左傳》已不再是人人所習誦，傳文也非人人能懂，所以本書仍然不列傳文，而以「題解」白話簡述其始末，以作為閱讀《博議》的背景資料。

本書因篇幅浩大，所以力求簡要，加以本書重在文章寫作，而不在名物訓詁，因此以新譯為主，語譯能交代清楚的，更不再注釋。注釋以隱文僻句的出處說明，及語譯時未能詳明者為限，所以與坊間同類的書相比，就顯得注釋很少。新譯部分與坊間語譯，出入很多，讀者不妨詳加比較，自可判斷其優劣高下。

「研析」部分重在文章脈絡的分析，變巧手法的探究，偶爾也探討到思想的層面，只是用來提供讀者欣賞與分析的端緒。文章的精華與奧妙，有待讀者自己心領神會，而且欣賞與分析，常因角度不同而有不同的結果，各人所悟不同，所得不一，希望讀者不要被本書所提

供的「研析」所拘限。

本書由本人與李振興兄共同執筆，前十四卷由本人執筆，後十一卷由振興兄完成。由於學殖所限，粗陋疏謬，在所難免，尚祈 博雅方家，予以匡正。

民國八十年六月

簡宗梧謹識

編按：本書初版印行於民國八十年，因內容紮實嚴謹，廣受士林學子與讀者採用，歷年來已多次加印銷行。早期限於物質條件，以鉛字活版排印，排版字體較小，且字體經多次印刷後，已漸模糊，不利閱讀。現本局投入無數人力物力自行研創之中文電腦排版字體已臻完成，字形美觀穩重；為讓讀者獲得更好的閱讀效果，適值本書再版之際，乃採用最新電腦字體，以較大字號重加排印，除改正舊版少數誤植外，並分成上下二冊裝幀，以利攜帶和閱讀。特此說明。

導 讀

簡宗梧

一、作者事略及著述

呂祖謙，字伯恭（西元一一三七一—一一八一年），人稱東萊先生。祖先為萊州人，八世祖龜祥，知壽州，所以遷到壽春。六世祖夷簡，為仁宗名相；家徙開封。五世祖公著，也在哲宗時居相位，《宋史》稱宋興以來，宰相以三公平章重事者四人，呂家父子竟居其二，所以為士林所豔羨。高祖希哲，曾任兵部員外郎，得罪新黨，出知相州。曾祖好問，為資政殿學士，封東萊郡侯，移居婺州。祖父弼中，為右朝請郎，贈右正議大夫。其父大器，為右朝散郎，贈朝請大夫。家世顯赫，可見一斑。

祖謙本其家學淵源，得中原文獻之傳，所以根柢深厚，只是年少時，性褊急，後來讀到孔子「躬自厚而薄責於人」的話，便一改平時忿急之性，而心平氣和。因此朱熹就說：「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。」祖謙曾跟林之奇、汪應辰、胡憲三位先生就學，又和張栻、朱熹為友，三人齊名，世稱東南三賢。隆興元年（西元一一六三年）進士及第，又中博學宏詞科。

歷任太學博士兼史職。在輪對時，勉孝宗以聖學。免父喪後，召為祕書郎、國史院編修官、實錄院檢討官，重修《徽宗實錄》，遷著作郎。又奉詔取臨安書坊所謂《聖宋文海》而重編，乃輯建隆以後、建炎以前諸賢文集，精加校正，取其辭理之醇，有補治道者，以類編次，定為一百五十卷。書成，孝宗賜名為《皇朝文鑑》（後人稱之為《宋文鑑》）。

祖謙之學以關洛為宗，與朱熹共同擇取周（敦頤）、張（載）、二程（頤、顥）之書，分類輯纂，而成《近思錄》十卷。祖謙所編之書，除《皇朝文鑑》及《近思錄》外，又取韓愈、柳宗元、歐陽修、曾鞏、蘇洵、蘇軾、張耒之文凡六十餘篇，各標舉其命意布局之處，示學者以門徑，而為《古文關鍵》二卷。又為范祖禹《唐鑑》二十四卷作注。

祖謙長於經史，於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春秋》，多究古義。著有《古周易》二卷、《增修東萊書說》三十五卷、《呂氏家塾讀詩記》三十二卷。其於《春秋》則研究《左傳》而有三書：一為《左傳類篇》六卷，取左氏之文分別為十九目；此書久無傳本，惟散見《永樂大典》中。二為《左氏博議》二十五卷。三為《左氏傳說》二十卷、《左氏傳續說》十二卷。於史學方面，乃取司馬遷年表大事記之目，編年繫月，以記春秋以後大事，始於周敬王三十九年（西元前四八一年），迄漢武帝征和三年（西元前九〇年），其書作於淳熙七年（西元一一八〇年），每一日排比一年之事，本想寫到五代，後因病作罷。另作《大事記通釋》三卷，如說經家之綱領，專錄經典中要義格言，以及歷代名儒議論；《大事記解題》十二卷，則如經之有傳，略具本末，而附以己見，舉凡《史記》和《漢書》之同異，以及《通鑑》得失，都為之縷析

而詳辨，又在典章、制度、名物、象數有旁見側出者，都夾注在句下，使讀者得推闡貫通之。朱子稱《大事記》「精密為古今未有」，而《解題》「煞有工夫，只一句要包括一段意思」。《四庫全書提要》說「祖謙此書，去取詳略，實有深意，而議論正大，於古今興衰治忽之理，尤多所發明」。

此外，又著《少儀外傳》二卷，為訓課幼學而作，取《禮記·少儀》為名，其中雜引前賢之懿行嘉言，及立身行事、應世居官之道。《歷代制度詳說》十二卷，分十三門，前列制度，敘述簡賅，後為詳說，議論明切。此書採輯事類，或為答策之備，本為家塾私課之用，其後展轉傳錄而付梓。

祖謙死後，其弟祖儉及從子喬年，先後掇拾遺稿，為《文集》十五卷；以家範、尺牘之類為《別集》六卷；策問、進卷之類為《外集》六卷；年譜、遺事之類為《附錄》三卷。另外又集其論說為《麗澤論說集錄》十卷。

以上所列各書，除《左傳類編》，因無傳本，故不為收錄之外，各書都收入《四庫全書》之中，其著述為後世所重，由此可見。其晚年會友之地——麗澤書院，在華城中，在其死後，郡人即以為祠，其受敬重，可見一斑。

祖謙於《宋史》有傳，傳中述其著作，尚有《閫範》、《官箴》、《辨志錄》、《歐陽公本末》，其或收入《外集》、《別集》中。另在《宋史·藝文志》著錄《春秋集解》三十卷（陳振孫《直齋書錄解題》謂其十二卷，或疑三十卷為呂居仁本）、《宋通鑑節》五卷、《呂氏家塾通鑑節

要》二十四卷。晁公武《郡齋讀書志》更錄有呂氏《史說》十卷，其著述之豐，可以概見。

呂氏除於《宋史》有傳外，傳記資料尚見於《宋史新編》、《史質》、《南宋書》、《皇朝道學名臣言行外錄》、《伊洛淵源錄新增附錄》、《伊洛淵源續錄》、《考亭淵源錄初稿》、《南宋館閣錄》、《南宋館閣續錄》、《宋人軼事彙編》、《宋詩紀事》、《宋元學案》、《宋元學案補遺》、《南宋文範作者考》、《金華賢達傳》、《金華先民傳》、《景定嚴州續志》、《新安志》等。宋人文集述及東萊先生的也很多，如朱熹《晦庵集》有〈呂氏家塾讀詩記後序〉、〈婺州金華縣社倉記〉、〈跋呂伯恭日記〉、〈題伯恭所抹荊公目錄〉、〈問呂伯恭三禮編次〉、〈書近思錄〉、〈書臨漳所刊四經後〉、〈跋辨志錄〉、〈跋呂伯恭書說〉、〈呂伯恭畫像贊〉、〈祭呂伯恭著作文〉等十一文；周綸《文忠集》有〈祭呂伯恭禮部文〉、〈跋呂伯恭日記〉、〈論文海命名〉、〈繳進文鑑序〉、〈皇朝文鑑序〉；張栻《南軒集》有〈閭範序〉；樓鑰《攻媿集》有〈辨志錄序〉、〈東萊呂太史祠堂記〉、〈祭呂太史文〉；魏了翁《鶴山集》有〈呂氏讀詩記後序〉、〈跋朱呂學規〉；程秘《洺水集》有〈書皇朝文鑑後〉；陸游《渭南文集》有〈跋呂伯恭書後〉；真德秀《西山文集》有〈南軒東萊帖跋〉、〈東萊與劉公帖〉、〈東萊大愚二先生祠記〉；王柏《魯齋集》有〈古易音訓〉、〈古易跋〉、〈跋勅額代明招作〉、〈跋麗澤諸友帖〉；劉黻《蒙川遺稿》有〈東萊呂成公贊〉；袁甫《蒙齋集》有〈東萊書院竹軒記〉、〈鄞縣學乾淳四先生祠記〉；韓元吉《南澗甲乙稿》有〈呂伯恭真贊〉；葉適《水心集》有〈祭呂太史文〉；陳傅良《止齋集》有〈祭呂大著文〉；陸九淵《象山集》有〈祭呂伯恭太史〉；陳亮《龍川集》有〈祭

呂東萊文》、《又祭呂東萊文》等。年譜有二，明阮元聲編《東萊呂成公年譜》一卷，另有一不著錄撰人《呂東萊太史年譜》一卷，收入《東萊文集》附錄，都是研究呂東萊所可以參考的資料。

二、呂氏的左傳著述

依據《宋史·藝文志》，呂祖謙有關春秋類的著作，有：《春秋集解》三十卷，《左傳類編》六卷，《左氏博議》二十卷，《左氏說》一卷，由其門人張成招標注《左氏博議綱目》一卷，門人編《左氏國語類編》二卷。依據陳振孫《直齋書錄解題》，則有《春秋集解》十二卷，《左傳類編》六卷，《左氏國語類編》二卷，《左氏博議》二十卷，似為門人抄錄的《左氏說》三十卷。其間略有出入。

《直齋書錄解題》以為三十卷本的《春秋集解》，是呂本中的本子，其所見十二卷本，只是自「三傳」而下集諸家之說，各記其名氏，而其所取，也不過是陸（佃）氏、兩孫（覺、明復）氏、兩劉（敞、絢）氏、蘇（轍）氏、程（頤）氏、許崧老、胡文定數家而已，大體如杜謬《春秋會義》，所擇頗精，卻沒有自己的議論。

至於《左傳類編》六卷和《左氏國語類編》二卷，是就事實制度論議分門別類，前者分十九門，後者分十六門，都是資料的編纂。

《左氏博議》是為諸生課試而作，為佐其筆端，而取左氏書治亂得失之跡，加以疏說。

在宋時此書為經生揣摩科舉文章的讀本，所以流行很廣。

另外有《左氏說》。此書在《宋史·藝文志》著錄一卷，而《直齋書錄解題》和《文獻通考》則著錄三十卷，並且說：「於《左氏》一書多所發明，而不為文，似一時講說，門人所鈔錄者。」既為門人所鈔錄，也就有多寡之別了。《四庫全書》收《左氏傳說》十二卷，又從《永樂大典》輯得《左氏傳續說》十二卷。

他的《春秋集解》、《左傳類編》及《左氏國語類編》，既然是偏重資料的收集，而缺乏自己的議論，那麼我們要看呂氏有關《春秋左氏傳》的見解，就有待《左氏傳說》、《左氏傳續說》及《左氏博議》了。《左氏傳說》和《左氏傳續說》，當然不免有宋儒「好軋先儒」之習，但《四庫全書提要》以為其說多中肯，「於朝祭、軍旅、官制、賦役諸大典，及晉、楚興衰、列國向背之事機，詮釋尤為明暢」。至於《左氏博議》，重在課試，基本上它不是闡發《左傳》之作，而是藉《左傳》所載所評之事，論天下治亂之理，正如他自己在序文所說的：「凡《春秋》經旨，概不敢僭論，而枝辭贅喻，則舉子所以資課試者也。」

三、本書特性與讀法

由於呂氏在著作本書時，對「《春秋》經旨，概不敢僭論」，所以它基本上不是闡揚經義之作，它只是藉《左傳》所記所評之事，「枝辭贅喻」，「以資課試者」，所以是科舉的範文，是議論文（宋時所謂的策論時文）作法的教材，而論辨或糾正經旨傳義，只是偶一涉及而已。

儘管它不是專為論辨經旨傳義之作，但讀它之後，有益於讀「傳」時，開拓視野，殆無可疑。由於它是為「資課試者」而作，所以如瞿世瑛所說：「其所是非，大抵出於方執筆時偶然之見，非必確有所低昂軒輊其間，及其含意聯詞，不得不比合義類，引眾理以壯其文。」所謂時文，是希望「僥倖得當於有司之目」，要在場屋中脫穎而出，便不能在經旨傳義中陳陳相因，了無新意，而必須尋求一個新的角度，採取異乎尋常的觀點，用故實，借譬喻，重視修辭方法，考究行文技巧，而產生說服力。因此我們不能以呂氏之說為「定論而不可奪」。因為這正如瞿世瑛所說：「苟欲反其所非以為是，易其所以為非，亦必有眾理從而附會之，而淺見者亦將駭詫之，以為定論矣。」真理雖然只有一個，但仍有其多面性，我們惟有開拓視野，採取多元觀點，才能觀照真理的全面。尤其就研習文章作法的立場來說，不論是見仁，或是見智，只要公的理能通達人心，言之成理；或婆的理能比合義類，斐然可觀，就可以兩取而讀之。我們如果能用這種態度來讀呂氏《左氏博議》，那麼《朱子語錄》所謂「極為詳博，然遣詞命意頗為傷巧」的「傷巧」，就不是缺點而是優點了。

呂東萊是理學家，重「誠意、正心、修身」的內聖工夫，甚於「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」的外王作為，因此他的議論，常常「反復抉摘於古人之情偽者」，這種「誅心」的推衍，或不免有厚誣古人之嫌，尤其今日社會，比較強調外在行為的法律責任，或不免覺得那種強調「慎獨」的道德修為，並不合今日講求權利義務的法治要求。但讀其文應知其人，知其人應知其時，時空不同所造成的認知差距，是作為本書讀者所應該調適的。

研習文章作法既為研讀本書的主要目的，那麼有關本書的思想立場，倒成為較次要的問題，因此在研習本書時，應該仔細分析它翻案的技巧，看它如何運用譬喻，如何提引史事，如何起文，如何承轉，如何作結，如何使文章氣勢磅礴，如何產生說服力，作為以後我們寫作的參考，同時它所引的史事與借喻，都可成為我們日後取用之資。這些對於我們寫作能力的提升，將產生很大的作用。

四、本書篇數與版本

依呂東萊〈左氏博議序〉，本書著於屏居東陽之時，依其〈年譜〉，乾道三年（西元一一六七年）五月，持母喪居明招山，那年冬天有學子來講習者，次年冬，授業於曹家巷，已有《左氏博議》。依《宋史·藝文志》、《直齋書錄解題》及《文獻通考》，則本書為二十卷。但《丁氏藏書志》載有元刊巾箱本，便已二十五卷。依楊紹和《楹書隅錄》所記，《天一閣書目》所記明正德本，也是二十五卷；明時還有劉氏安正堂刊本，標題是《新刊京本詳增補注東萊先生左氏博議》，同是二十五卷。《四庫全書提要》以為祖謙門人張成招標注《左氏博議綱目》一卷，可能被書商將它散入本書各篇，後來傳本，總是在每題之下，附載《左氏》傳文，中間徵引典故，亦略注釋，所以就析為二十五卷。

《四庫全書提要》還提到：「楊士奇別有一本十五卷，題曰『精選』，黃虞稷稱明正德中有二十卷刊本，今皆未見。」但胡玉綰《四庫提要補正》以為所提明正德本，應是二十五

卷。《四庫全書》係採浙江巡撫採進本。其本有董其昌名字二印，又有朱彝尊收藏印，是舊帙之可寶者。因為當時坊間所傳，都是十二卷本，不但篇目不完整，字句也多妄削。而今坊間所見大多是清劉鍾英《輯注東萊博議》四卷本，只收八十六篇，所選的篇章文字，也多所刪削，正如胡鳳丹所說：「去取未精，頗多闕略。」當係古絳張明德所訂本。《四庫全書》本，校於乾隆五十年（西元一七八五年）六月。道光十八年（西元一八三八年），錢塘瞿世瑛參合明本、元本、文瀾閣本，及平湖胡氏所藏宋槧本，加以校刊，為後來採足本者之所從。清同治戊辰（西元一八六八年）輯刊《金華叢書》本（退補齋藏板），及光緒戊子（西元一八八八年）雲陽義秀書屋重雕足本，都是取瞿氏校本加以重刊，是目前較好的板本，也是如今新譯的主要藍本。

目前在坊間所看到有語譯的《左氏博議》，或稱為《白話東萊博議》，都是取八十六篇的節錄本，不但因去取未精，不足以知其全貌，更因刪削篇章文字，使文氣承轉，跳脫唐突，實不可取。

如今傳世的二十五卷足本，都說此書有一百六十八篇，但《四庫全書》在卷十少了一篇嚴華夷之辨，強調「治戎狄如治姦民」的〈晉里克帥師敗狄〉，在卷十二少了一篇強調「天下之可畏者，在於夷狄其心」的〈秦晉遷陸渾之戎〉，因兩篇於滿清入主中國之時，多少要犯忌，所以實際上只收一百六十六篇。而瞿氏校刊本，並非官修，篩選的尺度沒那麼嚴，所以多此二篇，才是真正的足本。